

德日民主化道路与伊拉克的现实选择

— 对美国民主改造伊拉克基本情况的评述

闫文虎

摘要: 美国要用改造德、日模式改造伊拉克, 遏制、淡化伊斯兰影响, 进而改造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然而, 美无视中东人民的宗教信仰、民族和政治文化传统, 只能是一厢情愿。

关键词: 德日民主化; 伊拉克; 改造

Abstract: The democratically transforming Iraq is important part of the Middle East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purpose is to suppress, downplay the Mohammedan influence by transforming of the diplomacy, culture and economic with the democracy and Valu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ansforms the Middle East and whole Islamic world, and implements the world hegemon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Road of Germany and Japan. But the United States ignore religion, ra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result in the anti-American sport of whole Iraq.

Key Words: The Democratization Road of Germany and Japan; Iraq; Transform

2003年2月26日, 布什将改造伊拉克与战后改造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 希望以伊战为契机, 二战后改造德、日的方法为道路, 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对伊进行民主改造, 尔后又相继推出美国与中东伙伴关系、美国与中东自由贸易区、“大中东民主计划”和改版后的“大中东及北非计划”。民主的种子虽然播下了, 美国人所希望的一个民主、繁荣的伊拉克却并没有出现。

一、德、日民主化道路的基本模式

二战后, 美国对其占领的西德、日本实行代理人政府, 或由美直接占领式的托管, 或将权力移交给选举出来的亲美当地领导人, 使美式制度成为被占领国政治制度核心。所谓德、日民主化道路, 是二战后, 美凭借武力对德、日实行的美式民主改造, 使之“成为民主国家, 不再对世界构成威胁。”^[1]

政治上, 禁止一切法西斯组织, 审判战争罪犯, 使两国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 从而保障了两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在德国, 成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军事法庭, 对24名纳粹战犯进行了“纽伦堡审判”, 75%犯有战争罪的人被判处罚款, 20%的人限制其择业或禁止担任公职, 取缔法西斯性质的“社会帝国党”, 禁止德国共产党活动, 制订《占领法规》, 由美、英、法三国代表组成“盟国高级专员公署”, 行使联邦德国(西德)的外交、国防、外汇及外贸权力, 监督联邦和各州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权力, 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波恩宪法), 对联邦德国的性质、立

法机构的组成、政府首脑(联邦总理)的产生及其外交、国防、货币、海关、铁路、航空、邮电政策作了规定, 对联邦国家和各州的职责作了划分。在日本, 废除了日本战前的《宗教团体法》, 禁止宣传或传播神道或其他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释放了全部政治犯, 撤销法西斯法令《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 解散了特高警察机构, 取缔所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政党和社会团体。到1951年12月, 日本被解除的国家主义团体达233个, 21万余人被解除公职。组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在横滨、马尼拉、南京、新加坡等地设立军事法庭, 对受到起诉的乙级和丙级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 被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5423人, 被判刑4226人, 其中有941人被判处死刑。修改日本宪法, 促使日本天皇发表《否定神权宣言》; 制定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 使日本完全放弃战争和拥有军队, 从军国主义制度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

军事上, 规定两国武装力量限于防务所需的最低人数, 清除某些永久性工事和军事设施。在德国, 由英、美、法、苏四军事司令官组成共同管制委员会, 对德国分区占领。在日本, 成立了盟国占领军司令部, 下设参谋本部以及民政、法务、经济、科学、民事通讯、自然资源、统计资料、民间情报、教育和公共卫生9局, 所有人员均由美军人担任, 设8个地方军政部。解散和复员336万军队和海外的375万日本军事武装, 实现日本非武装化。规定

军工厂停产,废弃有战斗力的军备。

经济上,设法保持原有的工业结构,复兴两国经济。通过“政府救济占领区拨款-GARIOA计划”援助德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对德国进行经济援助。1948~1952年共援西德14亿美元。^[2]在日本,推行“农地改革、解散旧财阀”等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冻结15个大财阀资产,废除租佃制,将土地分给农民,逐步清除国家中的封建成分。成立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制定《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通过立法强化日本经济复兴,作为未来美国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强调美国政策应努力“排除日本振兴对外贸易过程中现存的诸种障碍,促进日本出口的恢复与发展”^[3]。美还制订了一份编号为SWNCC162/2的《日本人再定位》机密文件,颁发了《关于教育根本改革的备忘录》,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如对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

二、德、日民主化道路在伊的嫁接

德、日经验让美国人感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天定命运”^[4],肩负教化世界的使命,承担着推进自由的义务。阿富汗战争一结束,美立即酝酿、抛出“邪恶轴心”说,将萨达姆政权列为“对美安全、地区稳定及民主和自由的威胁”^[5],决意“先发制人”,以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用改造德、日的成功经验来改造伊,使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政治上,摧毁萨达姆政权体系,解散前政权所有机构,建立亲美政权,实施政治民主化。伊战后,美把建立民主政权作为美对伊改造的第一面旗帜。解散伊复兴党,禁止复兴党成员在政府供职。成立战犯法庭,对死心塌地追随萨达姆并对伊、科人民“犯下罪行”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要员、共和国卫队将领、复兴党主要头目等做出“正义审判”。^[6]对一切愿与萨达姆划清界线且无“血债”的前党、政、军、情人员予以赦免,根据民主制度和经济重建的要求量才录用。在伊建立一个“为全体伊拉克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由该政府控制石油资源,让石油资源“为伊人的福祉和民主事业服务”,使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样板。^[7]2003年9月1日,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了由25名部长组成的临管会,成员全由美国挑选和任命,其中什叶派穆斯林13名、逊尼派穆斯林5名、库尔德人5名、土库曼人1名和基督教徒1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临管会有3名

妇女代表。

经济上,对伊进行经济援建,推行市场经济,允许有限国际化。美为伊临管会紧急制定了多项大规模经济改革和重建计划,先拨款870亿美元,用于伊石油开采、炼油设施、铁路网线、机场和港口的重建和修复。督促临管会和临时政府加快经济改革,邀请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盖达尔、保加利亚前总统、爱沙尼亚前总理一道担任了伊临时行政当局的经济顾问。

经济市场化是美对伊民主化改造的第二面旗帜,其核心是推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伊战后,美打起“国际化”招牌,使伊经济援助和重建项目“国际化”,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并输送志愿人员,在伊建立了5.5万个食品和药品分发站,消除因萨达姆统治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牵头召开“援助战后伊重建的国际会议”,动员西方世界、产油国、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出资建立“伊拉克战后重建专项基金”。美还承诺提供200亿美元,世界银行捐款30~50亿美元,日本、英国、西班牙和欧盟也分别捐15、8.35、3和2.31亿美元。力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483号决议案,为伊重建筹措资金提供基础,废除由联合国主导下的对伊制裁监管机制,设立伊拉克发展基金。2003年10月,又在马德里召开援伊重建国际会议,为伊筹措了33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呼吁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减免伊债务。

军事上,解散共和国卫队,改组伊常备军,保持军事安全化,使其为民主制度服务。一方面,加紧追捕55名伊前政府高官,清剿反美武装,至去年12月25日,55名伊前高官已有40多人被捕和击毙,其中包括萨达姆的两个儿子。2004年,美准备拿出22亿美元训练伊军1.3万人。^[8]另一方面,美邀请70多个国家出兵伊拉克,寻找并销毁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制造能力,加快组建伊军队及对伊军警进行培训。计划组建3个师的“新军”和一支1.08万人的伊准军事部队,最终规模将达4万人,目前,已组建4营。

思想上,“西化”伊拉克青年,培养“有文化的一代”。主要通过培养大批师资,向学校提供教育投资来实现。资助民主、人权等参政组织,建立西式民主选举模式,促进司法改革等。据美全国广播

公司(NBC)报道,美计划对3.2万名伊教师进行培训,以改变下一代人的思维方式。此外,对所有中小学12个年级的教科书作审查修改,砍去一切被认为可能引起争论的内容,如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以及有关以色列、美国、库尔德的部分、一切有关萨达姆与社会复兴党的赞美之词和一切反美内容。

三、伊的现实选择

美对伊民主化改造的目的,是“确立新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9],以缔造中东永久和平、繁荣、自由和民主。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伊并没有成为美预期的民主样板,却成了第二个“越南”。从美宣布在伊的主要战事结束到今,伊境内形成了各个层面的多条反美战线。

反美运动催生了伊民族主义。伊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在反美中相互呼应,从普通百姓,到极端武装分子,都显现出了这种联合精神,呈现结成一个“反占领同盟”的趋势。为支援费卢杰城内受困的逊尼派百姓,什叶派穆斯林勒紧裤带,捐出奶粉等食品。库贝实的逊尼派向南部的什叶派萨德尔提供了约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称“我们是朋友加兄弟”。^[10]伊武装力量不仅控制了一些城市,还屡屡切断了从约旦安曼到巴格达的道路。美军在伊的最高指挥官桑切斯中将对这一态势深感忧虑,说:“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不让这种联系超越战术层面。”此外,当什叶派领袖萨德尔揭竿而起反美时,伊安全部队(新军、民防部队、警察等)的20%~25%的人拒绝执行任务,一些成员干脆投身极端武装组织,调转枪口打美军。伊战后成立的第2营的620名官兵公开拒绝前往费卢杰支援正与当地逊尼派武装分子作战的美军,称:“我们不想打伊拉克人。”

社会治安不断恶化,恐怖事件不断发生。萨达姆政权垮台至今,伊境内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不少驻伊使领馆轮番被劫,反美活动不断升级,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相互交织,先后制造了多起大规模爆炸事件。对伊境内的13万美军和2万英军的袭击事件也由每天的13~15起上升到20~25起,美军死亡人数至今已超1000人。

部族、教派矛盾凸现,新政府有名无实,国家没有凝聚力,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萨达姆政权的垮台打开了伊民族、宗教矛盾的潘多拉盒子,北部的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南部的什叶派长期受萨达姆

的政治高压,独立与问鼎国家权力意识被释放了出来。土库曼人对只得到一个临管会成员名额不满,在土耳其支持下,不时与库尔德人发生冲突。什叶派则对临时宪法允许库尔德人自治非常不满,认为这在事实上赋予了库尔德人对联邦法律的否决权。什叶派最高领袖西斯塔尼认为临时宪法授予库尔德人如此特权,不利于将来制订永久性宪法和未来伊权力的分配。国内派与海归派的矛盾重重,以及新政权带给人民的是社会秩序混乱,治安每况愈下,百姓无安全感。社会、文化活动无法恢复正常,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高达30%~40%,多数人的生活无保障,甚至比萨达姆时期还糟。

伊战同盟趋于解体。伊战后,有近40个国家出于不同动机向伊派兵,形成美国所谓的“伊战联盟”。目前,盟国军队被迫卷入与伊武装力量的冲突,部队参战和人员伤亡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2004年5月27日,西班牙撤出了在伊的1300名官兵,洪都拉斯、波兰、葡萄牙、泰国、挪威、新西兰、保加利亚等国也纷纷表示,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伊撤军,日本、韩国的驻伊人员也已停止了一切活动。这些美国盟友或重要伙伴的纷纷变调,令美英不仅在伊更孤单,且在国际陷入空前的被动。^[11]

四、伊斯兰土地难种美国草

从目前情况看,美对伊的改造不但与当年改造德、日的效果相差甚远,反而激起伊人民的强烈反抗,伊已成民族主义者、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和伊斯兰武装分子等的汇集地。

首先,美对伊和伊斯兰社会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宗教文化,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圣战”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性缺乏了解。美认为,将伊建成一个中东的“民主典范”,就可使民主理念在中东到处开花,最终形成中东地区的新秩序。布什政府宣布要战胜本·拉丹,就必须依靠美国所代表的自由和平等价值观。^[12]美国政府无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逻辑,不理解伊拉克人的价值观和文化,低估了伊斯兰教在伊拉克以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及其与西方式的现代化、民主、妇女权利等观念的不一致性。许多中东国家虽然实现了世俗化,但是,伊斯兰教对政治生活仍然保持着强大影响,是穆斯林大众信仰的依托和价值取向的源泉。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非伊斯兰的或反伊斯兰的,伊斯兰有其自己独特的政

治参与和治理传统,难以植入西方的民主理念。中东任何世俗化政府和政党都无法脱离伊斯兰传统思想体系,他们的民主观必须与伊斯兰教相融合,或用伊斯兰教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从传统观念讲,伊拉克是文明古国,部落传统势力强大,即使是现在,真正在社会低层发号施令的不是世俗政府,而是族长、宗教长老和部落酋长。部落成员高度忠于他们的穆斯林长老会。血亲复仇是整个中东社会的普遍传统,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是中东各个民族和宗派共同遵守的处世哲学。反美武装行动“体现了阿拉伯和伊拉克民族心理中根深蒂固的复仇情结,费卢杰的鞭尸事件则是报复美军的极端表现。”^[13]

其次,伊拉克缺乏美国民主发展的客观基础。二战前的德、日已是当时世界第二、三经济强国,具有有效的管理机构。两国在被改造之前都有一个强大的推崇自由民权的资产阶级、发达的市民社会,国家整合程度极高,都对西方政府形式进行过实验。^[14]而这些条件在伊拉克都不存在。伊拉克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习惯西方的民主制度,缺乏亲纳粹主义德国符合甚至接近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价值观、机构和实践方面的优势。与德、日不一样,伊拉克的社会制度远没有形成等级制度,基本上是零散的各自为营的社会,没有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或心理素质。把民主强加给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各国就像唐吉珂德一样不现实”^[15]。不仅如此,德、日两国的教育水平和工业水平较高,民族构成较单一,中央政府能够进行有效统治,所以在美国大量投入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也较快。在意识形态领域,二战后的德、日并不像伊拉克那样有着非常复杂的种族和宗教背景。相反,在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盛行的伊拉克,美国的民主改造从一开始就面临复杂激烈的文化、民族、宗族和精神体系上的差异与抗拒,使伊拉克走向民主呈现出不同于德、日的难度。也就是说,除了在痛恨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上和与美国有相同点外,美在伊找不到真正可以借力的支点。因此,“使这些国家哪怕是向半民主转变的前景都是很渺茫的”^[16]。从现状讲,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什叶派立即活跃起来,形成令人瞩目的力量;一些政治组织也在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企图填补萨达姆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流亡国外的什叶派宗教和政治领导人也纷纷回国,参与权力角逐。美国以军事占领的方

式输出政治制度,在伊扶持一个民主政权,等于在阿拉伯世界硬植一个异类器官。叙利亚与伊朗担心美国接下来对自己动武,沙特等海湾国家则担心美在伊拉克的民主试验将引发本国的政治动荡。

美国通过战争向伊拉克输出民主,伤害了伊民众的民族感情。美军采用“集体惩罚”方式,不惜用强大的炮火攻打清真寺,已造成上万名伊平民死亡,使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更加高涨。伊临管会成员帕恰奇认为,美军攻击费卢杰“完全是不能接受的和非法的”。英国一民意机构的调查显示,90%的伊民众不喜欢萨达姆,但视本国被战败是穆斯林的奇耻大辱,97.8%的伊人有反美情绪,其中武装人员超过400万。^[17]不少民众视本·拉丹为民族英雄,恐怖主义组织借此煽动民族情绪,呼吁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美占领伊拉克后,为获取反美武装和萨达姆政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批准用20多种强硬方法审问囚犯。美国军方情报机关(MI)还下令阿布格里卜监狱的宪兵不择手段地对伊战俘严刑逼供,把监狱变成地狱,逼俘虏开口招供……美军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美国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侵犯了国际法赋予战俘的最基本权利。一些阿拉伯人看到美军虐待事件报导后说:“驻伊美军的兽行比阿拉伯人的公敌以色列人野蛮百倍。美国人不是为了推翻萨达姆的暴政,而是为了控制中东,并发泄美国人民心中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仇恨”,“美国人正在中东播种仇恨。”^[18]

人们越来越相信,美国民主改造伊拉克不是为了伊拉克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阿拉伯世界和石油资源,推进它的全球战略。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德、日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进行了改造,其目的是让它们成为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如果不能迅速改变德、日经济的脆弱性,那么,“在它(日本)的国土内,共产主义颠覆势力就会蔓延、扩大”^[19]。因此,美国动用了超乎想象的资源来改造这两个国家,使两国的战后重建迅速取得进展。而对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缺乏实施条件,美国民众的支持也非常有限。美国渴望的是通过军事主宰、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的三位一体主义,以伊为基础扩大它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正如美兰德公司报告所指出的,军事打击伊拉克只是战术目标,沙特是战略目标,埃及和伊朗是大猎物。美国也真的认为

自己面临的威胁,诞生并存在于埃及、沙特和伊拉克的现行教育、社会和政治体系中,必须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西方模式强加于他们,即民主化、自由化和西方化,控制并减少对美国在中东利益的威胁。^[20]可见,“美国人占领伊拉克并不是为了通过伊拉克世俗社会的相对现代化而提升美国文明的威望,而是美国人正在肢解那些依然稳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对伊拉克的骚乱和混乱形势采取旁观态度,破坏伊的经济秩序,镇压反抗运动。这是一种狂热的排外,和种族主义没有什么区别。”^[21]

注 释:

- [1]新华社2003年11月6日电,美国总统新闻秘书办公室公布的布什总统在美国商会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布什总统论伊拉克与中东地区的自由》。
-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版,第43~47页。
- [3]NSC13/2,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S. Policy Toward Japan, 7 October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 VI. pp.858—861.
- [4]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 [5]“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New York, June, 1,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

(上接第48页)一系列问题上爆发出来。可以说,双方矛盾已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将上升为时代的主要矛盾。需要指出的是,面对美国一超独霸的强大压力,不少国家采取顺从、躲避或有限抵触,伊斯兰世界难以出现以国家名义的反美国家或国家集团。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次国家组织及反美势力的冲突则会更加突出。伊战后,双方的矛盾不会降温,而是会有新的发展。

注 释:

- [1]李鑫炜:《体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2页。
- [2]刘靖华:《‘伊斯兰威胁论’与美国利益问题》,见王缉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 [3]马小军:《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一个政治神话》,见王缉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 [4][1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九章、110页。

- [6]Adam Entous, “Bush Presses Iraq, Looks to Future without Saddam”, Associated Press, March 4, 2003.
- [7]“President Discusses the Future of Iraq”,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6, 2003.
- [8]亚历克斯·贝伦斯:《伊拉克新军队起步缓慢》,载《纽约时报》,2003年9月21日。
- [9]“Powell Says U.S. Has 45-Nation Coalition on Iraq”, Reuters, Washington D.C., Mar. 18, 2003.
- [10]高轶军:《伊‘反美反萨力量’开始结盟》,2003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 [11]黄晴:《西班牙撤军碰倒骨牌》,载《环球时报》2004年4月21日第3版。
- [12]【日】船桥洋一:《世界陷入文明的冲突》,载《朝日周刊》,2003年4月4日。
- [13]马晓霖:《解读伊拉克不会天下大乱的五大理由》,载《环球》,2004年04月27日。
- [14]【德】扬·罗斯:《新帝国》,载《时代》,2003年8月28日。
- [15]【美】肯·乔伊特:《愤怒、傲慢与政权更迭》,载《政策评论》,2003年4月至5月。
- [16]J. Diamond, J. Linz, S. M.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 p. 196.
- [17]弗·伊万诺夫:《伊拉克战争进入新阶段》,载《俄罗斯》,2004年4月13日。
- [18]涂龙德:《美国人正在中东播种仇恨》,载《世界新闻报》,2004年5月21日。
- [19]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pril 5, 1954.
- [20]《布什新计划图谋改造中东》,人民网2001年6月26日。
- [21]德尼·杜克洛:《美国的妄图狂与仇恨文化》,载法国《外交世界》,2003年8月号刊。

- [5]J·L·埃斯波西米:《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 [6]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 [7]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 [8]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293页。
- [9]罗伯特·库珀:《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载英《观察家报》,2002年4月7日。
- [10]翟晓敏:《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 [12]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54和57页。
- [13][14]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9、105页。
- [1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8页。
- [16]唐士其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9页。